

近代日本「農本」概念的歷史考察

曾 寶 滿^{*}

摘 要

本文聚焦「農本」概念在近代日本的語義變遷，探討「農本」論述如何受到傳統價值與西方思潮的交互影響。本文指出，日本在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的農本論者多為農政官僚、地主與政治家，他們沿用江戶時代的部分儒教規訓，以農業生產為產業之本，重視食糧與兵源的穩定，本質上是擁護國家與地主利益的治者論。嗣後伴隨資本主義的發展、基督教思想的普及，以及社會主義、社會政策學的發酵，1910年代至1920年代的農本論者，多為評論家、詩人、社會運動家，他們注重個體的自我實現與人文主義價值，抗拒工業社會機械式運作下的「原子化個人」，帶有反資本與反西方的特質。至1930年代初昭和農村恐慌發生後，識者試圖透過共同勞動、農村自治，摸索一條不同於西洋近代化的新式共同體之路，然而大正期以來的農本論者多半缺乏實際解決農村經濟問題的政策能力。在亞洲太平洋戰爭下，「農本」概念被總體戰體制論者將轉化為勤勞生產、自律，以及各盡本分的論述，陷入與國家社會主義、皇道哲學的政治共謀關係。

關鍵詞：農本、人文主義、反資本、反西方、總體戰體制

^{*} 作者現為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A Historical Analysis of the Concept of “*Nōhon*” in Modern Japan

Bau-man Tzeng^{*}

Abstract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semantic changes of the concept of *Nōhon* (agriculture as the foundation) in modern Japan, exploring how the discourse of the concept has been influenced by the interplay of traditional values and Western thought. It points out that the proponents of “agriculture as the foundation” from the late 19th century to the early 20th century were primarily agrarian bureaucrats, landlords, and politicians. They inherited certain Confucian morals from the Edo period, viewing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s the foundation of industry and emphasizing the stability of food supply and military resources. Essentially, this was a theory that supported the interests of the state and landlords.

Subsequentl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the spread of Christian thought,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socialism and social policy studies, the advocates of “agriculture as the foundation”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in the 1910s and 1920s were mostly critics, poets, and social activists. They emphasize individual self-realization and humanistic ethos, positioning themselves in opposition to the atomization of the individual under the mechanistic logic of industrial society. This orientation is often characterized by a critical stance toward capitalism and Western modernity. After the rural panic in the early 1930s, intellectuals attempted to explore a new form of community different from Western modernization through collective labor and rural autonomy.

However, the proponents since the Taisho era mostly lacked the policy capacity to effectively solve rural economic problems. Under the Asia-Pacific War, the concept of “agriculture as the foundation” was appropriated by total war theorists into discourses of diligent production, self-discipline, and fulfilling one’s duties, falling into a political collusion with state socialism and imperial philosophy.

Keywords: *Nōhon-shugi* (Agrarianism), humanism, anti-capitalism, anti-Westernism, total war system

近代日本「農本」概念的歷史考察

曾 寶 滿^{*}

一、前言

世界上許多農耕文明圈皆有重農或尚農的傳統，日本自古就屬於農耕文明圈的一員。¹古漢語脈絡的「農本」，語義為「農本商末」，大多時候作為重視糧食生產、賦稅收入的「農本國是」論，是以統治之便為出發點的經世論。²在西方，古典希臘和羅馬已出

* 本文係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近代日本社會改造思潮中的農本思想和政治實踐」（NSTC111-2628-H-002-021-MY3）和國立臺灣大學桂冠型研究計畫（NTU CDP-113L7755）的成果之一。本文承蒙兩位匿名審查老師及編委會提供寶貴修正意見，諸多啟發性建議使本文更臻完善，謹此致上誠摯謝意。本文撰稿期間，陳品安協助資料蒐集，陳泠樺、李書茵校閱文稿，亦在此一併致上謝忱。

¹ 《日本書紀》崇神天皇六十二年記載：「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參見飯田武鄉：《日本書紀通釈》第2卷（東京：教育出版センター，1981年），頁1422。

² 中國環境史家Brian Lander認為，在化石燃料成為人類可大量使用的能源之前，人類社會的能量幾乎來自植物的光合作用，故農業生產力攸關國家經濟，農業國家有強力誘因需要占領並移民於新領土，進而刺激經濟與人口增長。參見布萊恩·蘭德（Brian Lander）著，蔡耀緯譯：《王的莊稼：從農業發展到中國第一個王朝的政治生態學》（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24年），頁42。

現禮讚農耕和提倡農耕之道德價值的作品，而近代意義的“agrarianism”（農本傳統），則誕生於資本主義發展與工業化的脈絡。“agrarianism”是一種社會哲學與生態哲學，同時也是一種政治哲學。社會哲學面向的“agrarianism”，關心人與土地的有機性連結，批判資本主義的生產本位與利益本位，試圖為日益邊緣化的農業奪回話語權。³政治哲學面向的“agrarianism”，則強調農業比製造業更有可能確保政治的獨立性，鄉村生活比城市更能使人品行堅強，有歸屬感的農業生活使個人和共同體獲得更穩定的發展。⁴

而在19世紀中葉至20世紀上半葉的東亞，工業化庶幾等同西化，日本、中國的知識分子根據對本國經濟發展的認識、國情，以及改革訴求的不同，「農本」概念有別於古漢語「農本國是」論的語義脈絡，亦迥異於西方近代意義的農本傳統。本文的目的，在於考察近代日本「農本」概念的語義變遷及其歷史脈絡。

回顧近現代日本的農本主義（nōhon-shugi）⁵研究，關心的課題伴隨國家社會的當代關懷而發生變化，經歷了從資本主義、天皇

³ 參見Eric T. Freyfogle, *The New Agrarianism: Land, Culture, and the Community of Life* (Washington: Island Press, 2001).

⁴ 代表人物如美國第三任總統傑弗遜（Thomas Jefferson, 1743-1826）與美國作家克雷弗克（J. Hector St. John de Crèvecoeur, 1735-1813）的獨立自營農民（Yeoman）的理念。他們強調，獨立自營農民與民主政治在北美新天地相輔相成。此種論述批判英國的工業社會，從美國擁有重農傳統（agricultural fundamentalism）出發，形塑美國人的典範。參見David B. Danbom, “Romantic Agrarianism in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 *Agricultural History* 65, no. 4 (1991): 1-12.

⁵ 日本農本主義的英譯，在歐美研究者間亦尚未有定論。Ronald Philip Dore將“nōhon-shugi”譯為“agriculture-is-the-baseism”，T. Havens則將“nōhon-shugi”譯為“agriculture-as-the-essence-ism”。兩人都避免使用“agrarianism”一語直譯日本的農本傳統。參見Ronald Philip Dore, *Land Reform in Japa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Thomas R. H. Havens, *Farm and Nation in Modern Japan: Agrarian National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4).

制、社會哲學以迄地方經營、環境倫理學（environmental ethics）⁶的轉化。早在二戰前，便有自馬克思主義立場探究農本思想的論述。⁷二戰結束後，丸山真男（1914-1996）在探討戰前的農村支配、總動員體制和天皇制三者依存關係的論述中，指出農本思想和法西斯主義的親近性，⁸這項標籤使得農本思想在戰後很長一段時間，被視為軍國主義時代的負面遺產。1950年代末，《思想》與《思想の科学》兩部雜誌都曾探討日本的農本思想。⁹其中，安達生恒（1918-2000）質疑，過往的研究視角過於重視農本思想為權力所利用的一面，而忽略考察農本思想的複雜性與多樣性。¹⁰1960

⁶ 環境倫理學出現在1970年代生態哲學發展的脈絡，回應過往的人類中心主義。根據加藤尚武的研究，環境倫理學可整理為以下三個主要主張：自然的生存權（蘊含人與自然的共生）、世代間倫理（解決環境問題時不拖延至下一代）、地球有限主義（思考如何持續利用生態資源）。與本文所處理的「農本」概念關係最深的是，有關人與自然的共生之論述。參見加藤尚武：《環境倫理学のすすめ》（東京：丸善出版，1991年）。

⁷ 農業評論家櫻井武雄（1887-1972）著眼於生產手段和社會形態的問題，批判農本主義是封建社會的遺物，妨礙民主主義的形成。見櫻井武雄：《日本農本主義》（東京：白揚社，1935年）。

⁸ 丸山真男：〈日本ファシズムの思想と運動〉，《現代政治の思想と行動（増補版）》（東京：未來社，1964年），頁44。作者按：該文首先發表於1948年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東洋文化講座第2卷《尊攘思想と絕對主義》（東京：白日書院），頁97-184。

⁹ 1958年至1960年日本論壇出現一波圍繞著農本主義定義的討論。《思想》（1958年5月）與《思想の科学》（1960年6月）皆企劃過農本主義之主題。在此論爭中，櫻井武雄、奧谷松治（1903-1978）、安達生恒試圖定義農本思想的範疇，但依據論者的視角與立場的不同，這場關於定義的論爭並未達成任何共識。筑波常治（1930-2012）概括日本農本主義的本質是「依循自然的生活方式」，但又包含「對生產生活的勤勞」，以及隱蔽既有的權力差距的一面。參見筑波常治：〈日本農本主義序說〉，《思想の科学》第18号（1960年6月），頁4、6、11-12。

¹⁰ 安達生恒主張，人們應重視作為訊息接收方的農民的視角，日本的農本思想與法國重農主義的最大差異在於，日本農本思想是「立於共同體式發想法上，重視農業與農民的存在與立場的思想」。見安達生恒：〈農本主義論の再検討〉，《思想》第423号（1959年9月），頁56-68。

年代末，日本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高度經濟成長使人們開始反思都市生活中的非經濟性價值，而有重新評價戰前農本思想的研究動向。嗣後，幾乎是獨攬往後二十年農本主義思想研究的綱澤滿昭，跳脫過往圍繞著農本思想的定義論爭，以農本主義式的心情（日語原文為「情念」*jōnen*）作為標準，透過廣泛的事例，汲取「農本」思想的最大公因數。¹¹進入1990年代，岩崎正弥、野本京子、船戶修一的研究方法也依循綱澤滿昭的作法，根據各自農本思想之定義選定研究對象，針對人物的論述和行動展開分析，解析農本主義在不同人物與運動上所展現的特徵。¹²

然而，上述作法在思想的定義上，並不存在客觀標準與共識，而是根據研究視角的不同，選定的研究對象與課題隨之變化。對同一人物可能造成不同評價，¹³而在鬆弛的定義下，也可能因特定人

¹¹ 綱澤滿昭認為，近代日本農本思想的歷史意義在於，源自日本原始禮俗，對農業、農民和村落共同體賦予絕對性的價值，本質上是一種反動近代化的意識形態。參見綱澤滿昭：《近代日本の土着思想》（東京：風媒社，1969年）；綱澤滿昭：《日本の農本主義》（東京：紀伊國屋，1971年）。

¹² 先行研究中較特別的例子，如岩崎正弥主張農本思想乃「承認農（農業、農村、農民）之價值，並試圖實現其價值的思想」。基於此標準，文學者的歸農行為也被視為農本思想實踐的一環。參見岩崎正弥：《農本思想の社会史：生活と国体の交錯》（京都：京都大学學術出版會，1997年）；野本京子：《戦前期ペザンティズムの系譜：農本主義の再検討》（東京：日本經濟評論社，1999年）；船戶修一：〈農本主義の再検討——権藤成卿・加藤完治を中心に〉，《年報社会学論集》第12号（1999年6月），頁119-130。

¹³ 例如在寬泛的產業定義下，農政官僚常被視為農本論的發起者；但在強調情感認同的嚴格界定下，其資格便受到質疑。武田共治即持此後者觀點，他對農本主義的定義是：「反映日本農民式的感覺、心情與思維方式，對於耕作農民給予肯定的理解」。故武田共治針對近代論壇上首先提出「農本主義」一主張的農政官僚橫井時敬，以缺乏對農業和農民的禮讚為由，認為橫井時敬不是農本主義者。參見武田共治：《日本農本主義の構造：老農農本主義、官僚農本主義、教学農本主義、社会運動

物產生過度彈性解釋的空間。¹⁴這最終造成難以歸納的思想特徵，使日本「農本」概念的定義，至今仍莫衷一是。筆者認為，上述研究現況難以看到「農本」概念伴隨時代背景產生的歷時性變化，也失去概念本身在共時性區域進行比較的可能性。

有鑑於此，本文以「農本」及其關聯詞彙作為考察概念脈絡的準繩，探討19世紀後半葉至20世紀上半葉日本「農本」概念的變遷。有關近代日本的「農本」概念是從何時開始跳脫古漢語脈絡的「農本國是」論，開始展露近代意義之社會改革的訴求，以及「農本」論述如何受到傳統儒學價值與當代西方思潮的交互影響等問題，至今皆未被深入探究。本文的考察將有助於釐清上述面向，期待為跨國視野下的概念比較，提供日本案例作為基礎之一。

就詞彙而言，19世紀至20世紀的日本，「農本」相關的漢字詞彙為「農本」與「重農」，歐洲詞彙則為“agrarianism”和“physiocracy”。漢字詞彙方面，「農本」的籠統意涵雖是「以農為本」，但關鍵更在於以何為本。論者對於是否反工商、是否反資本，以及是否反西方的態度，亦大相逕庭。歐洲詞彙方面，“agrarianism”一詞有兩種含義，一是將農業視為可以塑造理想社會價值的政治與社會哲學，尊重人與傳統、在地，以及自然環境的連結。另一則是重新分配土地的政治建議，特別是將土地分給貧民或

農本主義、アカデミズム農本主義の比較検討を通して》（東京：創風社，1999年），頁193-199、230-233。

¹⁴ 如綱澤滿昭從重視稻米耕作信仰的民族性論述之標準出發，將民俗學家柳田國男（1875-1962）與評論家保田與重郎（1910-1987）也視為「根本上的農本主義者」。又如岩崎正弥是根據人物的生平作為視作「農本主義者」與否的判斷基準，故他將作家石川三四郎（1876-1956）的歸農行為視為大正「歸農農本主義」的一種典型例子。但實際上，石川三四郎自始至終皆以「土民思想」自居，更在昭和初期明確撰文排斥「農本主義」此詞彙。有關農本主義者的認定，包含他者與自我認定的兩個範疇，更增加了定義的難度。參見綱澤滿昭：《日本の農本主義》（復刻版）（東京：紀伊国屋書店，1994年），頁5-6。

無地者，此語義的起源於古羅馬政治家提比略·格拉古（Tiberius Gracchus，163BC-133BC）的土地改革。¹⁵而“physiocracy”一詞則是指在18世紀後半葉的法國興起的經濟理論，該理論強調，國家的財富來源於農業與土地。本文會連帶考慮上述詞彙在語義起源上的細微差異，針對日本的情況進行考察。

二、明治期的「農本」概念

《日本書紀》記載，崇神天皇詔曰：「農，天下之大本。」¹⁶聖德太子（574-622）的《憲法十七條》有云：「農桑之節，不可使民。」¹⁷而在江戶時代，為政者也從統治的穩定性，提倡農本商末的經濟思想。¹⁸特別是17世紀後半葉開始，由於商品經濟的發達與商業資本日益膨脹，商人地位的提升影響到德川封建制下的四民秩序，開始出現從倫理方面強調農業重要性的思想家，以及以教化農民、復興農村為主旨的農村社會運動。¹⁹

¹⁵ 提比略在擔任保民官期間施行農地法（agrarian law），將征服而來的公有地劃分給市民，獲取賦稅與兵源。參見Luuk de Ligt, *Peasants, Citizens, and Soldiers: Studies in the Demographic History of Roman Ital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¹⁶ 飯田武鄉：《日本書紀通釈》第2卷，頁1422。此處的「農」，雖漢字意為農耕，但在古日語中，其蘊涵的概念與「なりはひ（生業）」一詞相通。「なりはひ」源自動詞「成る（なり）」，意指生成、發展，「なりはひ」則泛指人們以農耕、勞作等活動維持生計的生活方式。

¹⁷ 聖德太子著，聖德太子奉讀會編：《聖德太子全集》第3卷（東京：竜吟社，1944年），頁93。

¹⁸ 以熊沢蕃山（1619-1691）和荻生徂徠（1666-1728）的農兵論（批判兵農分離對武士和農民生計造成的負面影響）為代表。參見安丸良夫：〈近世思想史における道德と政治と經濟——荻生徂徠を中心に〉，《日本史研究》第49号（1960年7月），頁1473-1499。

¹⁹ 前者的代表是安藤昌益的「直耕」理論，後者則為二宮尊德（1787-1856）的報德活動。此外，江戶時代的學者荻生徂徠、山片蟠桃（1748-

德川武士政權下「農本」的關聯詞彙是「農者國本」或「農者國是」。江戶時代前期的代表者如太宰春台（1680-1747）在《產語》中遊說為政者提倡貴農，理由在於「民無所游食則必事農，民事農則田墾，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國富者兵強。」²⁰後期如國學者本居宣長（1730-1801），在《秘本玉くしげ》中指出，貨幣經濟活絡後貧富懸殊的問題，展現出憐憫貧農、提倡復古自然經濟的思想。²¹

明治初期，農戶的地租收入是政府收支項目中的最大宗，「農本」一詞仍維持古漢語中「農者國本」、「以農立國」的語義。如1876年的政府官報《太政官日誌》記載土木頭林友幸（1823-1907）對土木寮的職務說明中，提及「農本」一詞：

道路ヲ修メ橋梁ヲ架シ以テ農本ヲ固フシ交通ヲ便シ運輸ノ利ヲ起シ富國ノ基ヲ開クハ、乃チ本寮ノ主務にシテ、²²

〔作者自譯〕

修繕道路，架設橋樑，以固農本，便利交通，振興運輸之利，開創富國之基，此乃本寮的主要職務。

再如明治期的農學啟蒙家，亦是明治基督教指導者之一的津田仙（1837-1908）在《農業雜誌》的創刊號（1876）中，談及「我

1821）、太宰春台（1680-1747）、熊沢蕃山、佐藤信淵（1769-1850），也都有著貴農賤商的主張。有關安藤昌益的「農本」論述，參見並松信久：〈江戸時代後期の農業思想における自然と生産〉，《農林業問題研究》第20号第3期（1984年9月），頁124-131。

²⁰ 有關《產語》及其作者，參見陳威璿：〈太宰春臺《產語》及相關問題再探〉，《臺大文史哲學報》第83期（2015年11月），頁67-108。

²¹ 加田哲二：《日本社会經濟思想史》（東京：慶応通信，1962年），頁203-209。

²² 太政官：《太政官日誌・明治九年（1-6月）》（京都：村上勘兵衛，1876年），頁13。

邦古來以農立國」、農為「國家獨立之大本」。²³津田仙出身佐倉藩，幕末輾轉學習英語，於1867年作為德川幕府使節團的翻譯駐留美國半年。駐美期間，津田深刻感受到美國的富強在於農業，他認為，「四民平等無尊卑之別，特別是農家富裕。瞭解到農業乃為國家帶來幸福之事業，因而有志提升我國農家之地位，發達我國農業。」²⁴津田仙返國時，帶回許多國內未有的醫藥書、農學書與農產種子，也在東京購入土地，經營實踐農場。²⁵津田仙於1873年赴維也納世界博覽會調查西洋農業物產的精髓，當時他最大的心得之一，便是新教信仰興盛的國家，國運日益進步。由於津田仙所追求的是讓農民享有盈利或合理的經濟生活，他認為基督教信仰可以喚起日本農民的合理性精神，幫助農民成為追求營利的自立之個體。²⁶津田仙將基督教信仰與推廣農學合而為一的做法也影響到當時朝鮮的農學者安宗洙（1849-1896）。²⁷

津田仙從基督教信仰與農業的發展程度兩方面，高度評價美國。他於《農業雜誌》創刊號的扉頁以及該誌初期的封面，皆印製美國開國元勳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1732-1799）的

²³ 津田仙：〈農業雜誌編輯大意〉，《農業雜誌》第1号（1876年1月），頁1、3。

²⁴ 高崎宗司：《津田仙評伝——もう一つの近代化をめざした人》（浦安：草風館，2008年），頁31。

²⁵ 高崎宗司：《津田仙評伝——もう一つの近代化をめざした人》，頁31-32、39-41。

²⁶ 並松信久：〈明治期における津田仙の啓蒙活動：欧米農業の普及とキリスト教の役割〉，《京都産業大学論集・社会科学系列》第30号（2013年3月），頁85-122。

²⁷ 津田仙也在安宗洙的介紹下，和來日的朝鮮官僚李樹廷（1842-1886）會面。李樹廷在津田的推薦下閱讀漢譯聖書，以及參加東京新榮橋教會的禮拜後，對基督教產生興趣，是朝鮮半島首批受洗的基督教信徒之一。有關津田仙與朝鮮知識分子的往來，參見金文吉：《津田仙と朝鮮——朝鮮キリスト教受容と新農業政策》（京都：世界思想社，2003年），頁85-107、113-116。

格言：「農者，人民職業中最健全、最尊貴、最有益者也。」

（Agriculture is the most healthful, most useful and most noble employment of man.）根據津田仙所撰《農業雜誌》的發刊詞，他認為國家振興農業的最終目的之一，在於增加農產品的輸出，使日本貿易日益盛大。津田仙於此追求以農富國的立場，以及重視農工商相輔相成的態度，相當顯著。被後世譽為近代農學教育奠基者的津田仙，自1870年代起，引進許多西方的種植技術與知識，積極推廣農業教育（設立學農社農學校）與出版農業書籍、雜誌，努力將以農富國的理念推廣至大眾。

「農本」相關的歐洲詞彙方面，明治初期“agrarianism”已在辭書上出現，但不做農本主義解，而是採平均土地之意。以《和蘭字彙》（1858）作為基礎進行編選的高橋新吉（1843-1918）等編《改正增補 和訳英辞書》（1869）並未收錄該詞，但荒井郁之助（1836-1909）編《英和对訳辞書》（1872）和《廣益英倭字典》（1874），作為名詞收錄了“agrarianism”，譯詞是「平等分割家產等物（平等に分ること〔家督などを〕）」。²⁸另一方面，在《英和字彙：附音插图》（1873）和《英和和英字彙大全》（1885-1886），也存在「地區」此種譯法。²⁹“agrarianism”在譯詞上存在差異的情況，隨著民眾政治意識的抬頭與西洋史教科書普及的影響，開始發生變化。自1870年代後半至1880年代，爭取議會政治的自由民權運動在日本興起，參與該運動的群體從士族擴散到富農階層，作為運動目標所揭櫫的自由平等近代權利思想，也透過

²⁸ 參見荒井郁（之助）編：《英和对訳辞書》（東京：小林新兵衛，1872年），頁13，以及鹿田等編：《広益英倭字典》（金沢：大屋愷哉等，1874年），頁21。

²⁹ 參見柴田昌吉、子安峻共編：《英和字彙：附音插图》（東京：日就社，1873年），頁27，以及市川義夫編訳，島田三郎校：《英和和英字彙大全》（横浜：如雲閣，1885年），頁16。

各地的政談演講等活動獲得普及。³⁰而此段時期，也是明治政府推動義務教育的時期，當時多數西洋史書籍會提及，古羅馬時期為了因應貧富懸殊差距而推行的土地改革。³¹在上述思想條件的影響下，在1880年代後半葉，“agrarianism”作為一種平均土地、財產的政治意識逐漸確立。在《英和对訳普通応用初学字典》（1886）被譯為「財産平分」，³²《和訳字彙：ウェブスター氏新刊大辞書》（1888）中的譯詞是「田土平分法、財産平均論」，³³《明治英和字典》（1889），則被譯為「均分田土，或支持均分田土之人的主義（田土均分法。田土均分法ニ左袒スル人ノ主義）」。³⁴井上哲次郎（1856-1944）的《哲学字彙稿本》（1897），更簡明濃縮其意為「地面均分論」。³⁵此後至1920年代，“agrarianism”都維持平均土地論的用法。³⁶

明治中期「農本」概念相關的歐洲詞彙中，比起“agrarianism”，更常見的詞彙是“physiocracy”，大多用於介紹經濟學理論與法國近代史的脈絡。在1880年代末1890年代初，如雜誌《日本商業雜誌》

³⁰ 參見松沢裕作：《自由民権運動——〈デモクラシー〉の夢と挫折》（東京：岩波書店，2016年），頁73。

³¹ 譬如原勇六編：《西洋史》第1卷（東京：文学社，1898年），頁39。

³² フースチン・ナッタル著，松山察太郎摘訳：《英和对訳普通応用初学字典》（京都：文求書堂，1886年），頁15。

³³ イーストレーキ、棚橋一郎共訳：《和訳字彙：ウェブスター氏新刊大辞書》（東京：三省堂，1888年），頁25。

³⁴ 尺振八譯：《明治英和字典》（東京：清水卯三郎，1889年），頁26。

³⁵ 井上哲次郎：〈附録 哲学字彙稿本Aの部〉，《哲学雑誌》第12卷第119号（1897年1月），頁15。

³⁶ “agrarianism”一詞要等到1920年代才在文章脈絡中出現，主要指稱當時美國的平均土地運動，大多是在講述美國政治運動的書文中提及。參見海軍省：《大正三—九年戰役各國海戰關係法令》第23輯（東京：海軍大臣官房，1920年），頁729，以及外務省政務局編：《外事彙報》（東京：外務省政務局，1919年），頁769。

和《社會》，都將“physiocrate”譯為「重農學派」。³⁷“physiocrate”在1891年份的《日本商業雜誌》即有兩例，僅示其中一例如下：

昔十八世紀の頃仏蘭西の「フィジオクラット」〔重農學派〕の人々は、土地を目して唯一の富源であるとし、農業のみが唯一の生産業であるとした、³⁸

〔作者自譯〕

在18世紀的法國，“physiocrate”（重農學派）的人們將土地視為唯一的財富來源，農業是唯一有生產淨值的產業。

在坪谷善四郎（1862-1949）的《仏蘭西史》（1890），同樣從介紹歐洲經濟理論的脈絡提及“physiocrate”：

重農主義〔ヒジナクラット〕の經濟説は、……専ら自然力を重んじ、殊に自然力中の土地を貴とび、富国の唯一策は土地の生産を奨励することを主義とせり、³⁹

〔作者自譯〕

重農主義（physiocrate）の經濟學説……主要重視自然力，特別是以自然力中的土地為貴，認為富國的唯一策略是以獎勵土地生產為主義。

³⁷ 參見加藤七五郎：〈日本貿易策汎論〉，《日本商業雜誌》第1卷第11号（1891年3月），頁28；岡百世：〈オーギュスト・コント〉，《社會》第1卷第1号（1899年1月），頁52。

³⁸ 嵯峨根不二郎：〈經濟原論〉，《日本商業雜誌》第1冊第10号（1891年3月），頁30。

³⁹ 坪谷善四郎：《万国歴史全書7仏蘭西史》（東京：博文館，1890年），頁302。

無論是在經濟學史或法國史的脈絡，引介法國重農學派的論者都明確地掌握該學派的思想特徵在於主張土地與財富之間的連結。

事實上，自明治初年至帝國議會開設的1890年代為止，是近代日本土地資本與工商資本的累積期。明治初期，政府為籌措殖產興業的財源，於1872年廢止「田畑永代売買禁止令」，1873年推行地租改正，統一全國地租。此舉一方面使政府得以事先估算國庫收入，建立近代化的會計制度，但另一方面也將農產歉收與米價變動的風險轉嫁到農民身上，造成了農民層的分化。⁴⁰不論農產豐歉與否，必須以現金繳納高額地租（3%）的作法，使得小規模經營的農民無法負荷天災、疾病等不可抗力的因素所造成的資金缺口，危機之際僅能依靠借貸或變賣土地，最終成為佃農。此外，中下層農民也負擔不起明治政府所獎勵的大農場所需要的近代肥料、種子與農具機械等費用。反之，擁有大量土地的地主卻有充足資本投入科學化的農場經營，或是將土地資本投入剛起步的公私立金融機構或工商業，蓄積工商業資本。在上述土地私有化與稅制改革的過程，地主與小農之間貧富日益擴大，土地作為個人財產在市場上成為流通與擔保的資產，地主們依靠土地迅速地蓄積資本。前述明治中期各式經濟學史與法國史論著中所引介的，關於重農學派主張土地與財富之關係的論述，正可解釋地租改正以來日本經濟的變化，符合時人的認識。⁴¹

1890年，日本舉行第一次眾議院大選，當時擁有投票權者為年滿25歲並納稅15日元以上直接國稅的男性（占總人口的約1%），這使得初期議會很大程度反映地主階層的利益。⁴²近代日本論壇上

⁴⁰ 參見近藤哲生：〈地租改正と寄生地主制〉，《土地制度史學》第3卷第3号（1961年4月），頁30。

⁴¹ 參見註34、35。

⁴² 荒木幹雄：〈明治維新の土地変革と地主制形成の研究：丹羽邦男先生の業績とその継承〉，《農業史研究》第27号（1994年12月），頁50-56。

第一次出現「農本主義」一詞，便是在此時期。1897年，帝國大學農科大學教授橫井時敬（1860-1927）在《實業の日本》上發表〈農本主義〉一文，呼籲應振興農業：

弱者を助けて強者の餌となるを免かれしむるは、抑も国家の義務にあらずんばあらず。若し国家にして農本主義を以て其主義となし、因りて適当に農民を保護するの政を施せしめば、是に於てか三業並び進んで相戾らず、各其長所を尽して、以て国家の健全なる發育に資し、国民は貧富甚だしく懸隔するの不幸を免れて、⁴³

〔作者自譯〕

幫助弱者免於成為強者之餌，豈非國家之義務。若國家以農本主義為其主義，施以適當保護農民之政，則三業（作者按：農工商）併進不退，各盡其長，有利國家健全的發展，使國民免於貧富懸殊之不幸。

在農商工業並進的情況下重視農業，這是延續前述津田仙重視農業為工商業之本的論述。同時期，新渡戶稻造（1862-1933）在《農業本論》（1899）中也主張「農為商工業之基礎」。⁴⁴可以說，19世紀末日本「以農立國」的語境是重視農工商三者並進。農政官僚與農學者們並不排斥，甚至是樂觀與積極地在農業中導入工業化與大型資本。這種可說是以農為諸產業之本的立場，為明治初期大多農學者與農政官僚所接受，持續至日俄戰爭後。這樣的想法與大正期興起的批判工業化與都市生活的「農本」思想有明顯區別。

⁴³ 橫井時敬：〈農本主義〉，《實業の日本》第1卷第5号（1897年10月），頁16-17。

⁴⁴ 新渡戶稻造：《農業本論》（東京：裳華房，1899年），頁433。

進而言之，有關19世紀末日本的「農本」概念，值得注意的，乃是與軍事力的連結。橫井時敬是從國防的角度來說明何以農為國本：

思ふに一国の元氣は中産の家に養はれ、殊に農家の間に発育するものなり。夫れ潔白、誠実、順良、活澄、剛毅、着実、真挚、強健、以て兵となるに適し、以て国を守るに適するは、是れ豈に農家の就中最も長ずる所にあらずや。夫れ土地は独り以て国を成さずと雖ども、国は土地と相離るべからず。故に彼の土地と最も関係あるの農民は、最も土地を愛するものなり、故に又た最も国を愛するものなり、故に亦た最も君に忠を懐くの民なり。⁴⁵

〔作者自譯〕

竊謂一國之精神養成於中産之家，特別是在農家之間孕育。夫廉潔、誠實、順良、剛毅、穩健、真挚、強健者，適合為兵，亦適合保衛國家，此不就是農家最擅長之處，夫獨以土地不成國家，國家亦無法離開土地。故與土地最有關係的農民，是最愛土地者，最愛國家者，亦是最忠君之民。

值得注意的是，橫井時敬對農民道德性的強調，以及前引文所言「幫助弱者免於成為強者之餌，豈非國家之義務」的統治邏輯，皆可發現受到江戶時代儒學規訓影響的痕跡。前近代日本政治思想與民眾思想史的先行研究已揭示，德川武士政權以「武威」和「仁政」作為支持幕藩體制的政治理念。⁴⁶當中，「仁政」思想提倡領主以深厚的慈悲心，抱持「撫育」與「教導」精神施行民政，百

⁴⁵ 橫井時敬：〈農本主義〉，頁15。

⁴⁶ 參見須田努：〈江戸時代の政治思想・文化の特質——「武威」「仁政」のせめぎ合いと「富国強兵」論〉，收於趙景達編：《儒教的政治思想・文化と東アジアの近代》（東京：有志舎，2018年），頁102-131。

姓則善盡本分，按時繳納年貢。⁴⁷村落指導者間則將儒教道德通俗化，強調蘊含自我鍛鍊乃至禁慾式的勤勉、儉約、謙讓與孝行等日常生活規範。⁴⁸橫井時敬強調農民人格「潔白、誠實、順良、活澄、剛毅、著實、真摯、強健」的論述，無疑有著將江戶時代的日本型儒教規訓延用至明治國家的農本論述之意圖。

此外，橫井時敬讚揚農民性情的論述，也與明治初期徵兵制所遭遇的難題有很大關係。日本自1873年開始施行徵兵制，但因初期有著戶主與繼承人的免役規則，欲免除兵役的成年男子紛紛過繼為養子、入贅或分家擔任戶主，實際上被徵召入隊者大多是負擔不起免役費用的貧農。⁴⁹1889年免役條文進行大幅改正，廢止戶主及繼承人免役的特權，並提升軍人待遇，廣求兵源。⁵⁰

揆諸歐洲國家工業革命和貿易立國的經驗，日本的論者很難僅從「富國」的面向主張農業的地位，故橫井時敬從「強兵」方面著

⁴⁷ 「仁政」思想在江戶時代首先普及於幕藩體制的執政者與思想家，中後期開始普及到幕藩的代官、村役人乃至以牧民官自負的民眾上層部，特別是天明大饑饉（1782-1788）之後，由於領主們面臨饑荒與藩政改革的難題，產生「牧民」意識在地方的流行。有關「仁政」思想的發展，參見小川和也：《牧民の思想——江戸の治者意識》（東京：平凡社，2008年）。此外，奈良勝司曾指出，近世社會的構造與幕末改革的狀況之間有何內在聯繫，應是值得關注的課題。見奈良勝司：〈近世社会の思惟構造と明治維新——研究史の状況と展望によせて〉，《日本思想史學》第50号（2018年9月），頁66。

⁴⁸ 安丸良夫指出，天明期以後農民層持續分裂，「通俗道德」論普及於日益荒廢的村落之間，如石田梅岩（1685-1744）、大原幽學（1797-1858）、二宮尊德等人的實踐活動。安丸認為，這種在民眾之間廣泛形成的自我鍛鍊的努力，以及其所蓄積的龐大社會性人格能量，成為日本近代化的原動力之一。參照安丸良夫著，島蘭進、成田龍一、岩崎稔、若尾政希編：《安丸良夫集1：民衆思想史の立場》（東京：岩波書店，2013年），頁2、8、12-31。

⁴⁹ 參見加藤陽子：《徵兵制と近代日本》（東京：吉川弘文館，1996年），頁46-75。

⁵⁰ 參見大江志乃夫：《徵兵制》（東京：岩波書店，1981年），頁83-85。

手，鼓吹農民作為兵源的適切性。類似想法在時人中頗為常見。如福井縣會議員亦是地主的山田斂（1865-1941），在《興農管見》一書（1901）的總論題名為「農本主義」，便是從廣大農民負擔著「血稅」（兵役）的角度，說明重視國防與重視農業有著同等重要性：

我国は古来瑞穂の国と称へ、農業を以て国の大本とし……
決して商工業を等閑視するにあらず、宜しく立国の基礎は
農業とし、商業工業は海外富力吸収の方法として、十分こ
れを発達振興せしめざる可からず……農は質樸にして勤儉
の美風に富み、鄰保相親み、深く郷土を愛す、加之身体強
健にして能く兵役に耐える等、国民として要する性格は悉
くことを具有するものなり。⁵¹

〔作者自譯〕

我國自古稱為瑞穗之國，以農業為國之大本。……我們絕
非輕視工商業，而是將農業作為立國之根基，將工商做為
吸收海外財富的方法，並充分發達與振興之。……農業使
人質樸富有勤儉之美風，相親鄰保，熱愛鄉土，加之可使
身體強健，承擔兵役，悉具有國民所需具備的性格。

山田斂的「農本主義」與橫井時敬一樣持農工商業並進的立場，主張穩定的農業可幫助工商業「富國」，而培植品行質樸純良的農民作為兵源，達成「強兵」。

上述以「農本」為方法，最終達到「富國強兵」之目標的論者，除了明治期的學者、地方議員外，也包含部分農政官僚。如擔任農商務省農務局長的酒匂常明（1861-1909）在其《日清韓實業論》（1903）中主張，農民比起群聚在不潔的都市巷弄、缺乏運

⁵¹ 山田斂：《興農管見》（福井：山田斂，1901年），頁1、4、5。

動的居民，體魄與氣宇都更佳上乘，並且農業自給自足的食糧與其他農產品之生產，可使國家將多餘的資金投資在工商業，最終達到「富國」的目標。⁵²

就「農本」的概念而言，橫井時敬、山田敏和酒匂常明所用「農本」一詞，實際上是以農業生產為產業之本，重視食糧與兵源的穩定。他們並非重視農民生活的「農本」，而是重視農業產值的「農本」，故他們雖然意識到社會的貧富差距日益加深，但並不對寄生地主制提出質疑，也未對中下層農民的貧困問題提出實際解決方案。尤有甚者，橫井時敬基於穩定地租收入的理由，主張農民不需要受中等教育，只需要受到足以維持生計的農業教育即可，露骨地指出農民若擁有太多知識將導致他們前往都市生活，使農村失去勞動力。⁵³換言之，甲午戰爭後至日俄戰爭間（1895-1905）這些強調農業產值的「農本」論，本質上是擁護國家經濟與地主利益的治者論，農民的重要性在於作為賦稅與兵力的來源，因此不樂見農民自由升學與選擇職業。

如此國家本位且漠視農民個體性的論述自然也受到不少有識之士的批判。民俗學家柳田國男（1875-1962）在其農政官僚時期曾作為酒匂常明在農商務省農務局的下屬，⁵⁴當時他便對這類擁護地主制的「農本主義」有以下批評：

農は国の本なりと云ふ議論を根拠として、国民の過半数が農業者であると云ふ理由には少しも敬服して居りませ

⁵² 酒匂常明：《日清韓實業論》（東京：実業之日本社，1903年），頁15、29-30。

⁵³ 橫井時敬著，大日本農会編：《橫井博士全集・農業教育百題》第9卷（東京：橫井全集刊行会，1925年），頁113-114、184-197。

⁵⁴ 柳田國男在籍農商務省農務局農政課一年半，當時酒匂常明為農政課課長。有關柳田的農政官僚經歷及其經濟思想，參見藤井隆至：《〈評伝・日本の經濟思想〉柳田国男——『産業組合』と『遠野物語』のあいだ》（東京：日本經濟評論社，2008年）。

ん。若し国民の過半数が農業者であるから農業を保護しなければならぬと云ふと第一に、そんならば半数から少し少ないものは圧迫を受けても宜しいかと云ふ問題に帰着します。他の方面も今日の傾向を以て進んで参りますれば、三十年五十年の後に農業が半数以内になったならば圧迫されたも宜いと云ふ言質を取られることにもなります。……何時まで経っても、其五分之一になっても八分之一になっても農業は国の本」である。⁵⁵

〔作者自譯〕

以農為國本的議論，其根據是以國民的過半數以上是農業者這樣的理由。我對此無法苟同。若僅因為國民的一半以上是農業者就必須保護農業，第一，那就會變成若農業者少於國民半數，那麼他們受到壓迫也沒關係，這樣的問題產生。今天這樣（作者按：農業衰弱）的傾向更進化的話，三十年、五十年後農業變成一半以下，那麼被壓迫也可以了。……不論到什麼時候，即便農業人口變成五分之一、甚至八分之一，農業也應該是國家之本。

幼時數度目睹飢荒之苦的柳田國男，更傾向於站在中下層農民的立場。針對當時壓迫中下層農民生計的地主制結構，柳田提出的解決方案是運用農業組合的資金，培植小農成為中農，擺脫他們由於缺乏資金無法購入肥料、機械，而陷入人力過度勞動或借高利貸的困境。⁵⁶相較於橫井時敬、山田斂主張的「農本主義」重視地租收入與農村人口的穩定，柳田國男的農政論述正視了日本傳統農村無法

⁵⁵ 柳田国男著，藤井隆至編：《柳田国男農政論集》（東京：法政大学出版局，1975年），頁176。

⁵⁶ 柳田国男：《農政学（早稲田大学39年度政治経済科第1学年講義録）》（東京：早稲田大学出版部，1906年），頁87-164。

適應資本主義的問題。可惜的是，以農業作為產業與國防之本的論述長期占據明治期農政學的主流。

整體而言，古漢語中已有的「農本」，在19世紀後半葉的日本受到明治政府「富國強兵」與「殖產興業」政策的影響，論者多在考慮賦稅收入的穩定與提倡農工商並進的論述下使用該詞。明治期的「農本」論者，事實上是將農業作為諸產業之本，並未脫去江戶時代以治者為考量的統治論色彩。而「農本」相關的歐洲詞彙“agrarianism”已在辭書上出現，但並不作為重視農業的思想或主張之泛稱，而是取自古羅馬時期平均土地的運動之意。這種重視平等的思維，在進入大正期後，成為從無政府主義思想來詮釋農本概念的一項特色。

三、大正期「農本」概念的質變

日俄戰爭後，日本重工業加速發展，逐步由農業國家向工業國家轉型。明治政府為籌措戰後經營的財源，增加地租與間接稅，⁵⁷並於1908年發布戊申詔書，勸誡國民勤儉純樸，推行地方改良運動，試圖重振町村財政。另一方面，自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隨著農業人口流入工商業，貧富懸殊加大，足尾銅山礦毒事件等公害問題受到世人關注，社會主義、社會政策學（social policy）和社會改良論（meliorism）等學知持續地被引介到日本。⁵⁸面對產業結構

⁵⁷ 政府進行租稅整理與調度戰後經營的財源，間接稅包含酒稅、砂糖消費稅、織物消費稅、石油消費稅等。參見宮地正人：《日露戰後政治史の研究：帝國主義形成期の都市と農村》（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73年）。

⁵⁸ 例如小崎弘道（1856-1938）在1881年在《六合雜誌》上發表〈近世社会党ノ原因ヲ論ス〉（英文題名：“The Cause of Modern Socialism”），大石正巳（1855-1935）於1882年翻譯《社会改造新論》。1897年，桑田熊藏（1868-1932）和金井延（1865-1933）等人成立「社会政策学会」。

改變與階級分化而帶來的困境，有識之士對於社會改革的嚮往不斷加深。1919年《改造》雜誌的創刊，以及1920年代普羅文學運動之盛行，⁵⁹這些政治經濟與思想文化上的刺激，使人們開始對「農本」一詞賦予不同以往的解釋。

大正期至昭和初期的「農本」詞彙，在運用上有兩點與過往不同。第一是將「農」廣泛解釋為「土地」或「自然」，其論述文脈多寓於對都市消費文化的批判，試圖在重返自然的實踐中，探尋生命價值的重構。如1910年代知識分子德富蘆花（1868-1927）、江渡狄嶺（1880-1944）、武者小路實篤（1885-1976）、中里介山（1885-1944）、石川三四郎（1876-1956）都身體力行「歸農」。岩崎正弥指出，大正期的「歸農」是將農業勞動作為一種生活實踐的方式，這些實踐「歸農」的知識分子不一定具備農業經營的知識或接受過農業教育，也不一定重視農業產值。他們重視的是農業勞動與大自然環境之間的對話，從中重新尋找人與自然的和諧關係，並透過將生活委以自然，使「個人」得以確立。⁶⁰1910年代「歸農」論者的「農本」具有濃厚的人文主義關懷，明顯與明治期將農業視為賦稅來源的「農本」不同。

「農本」詞彙在運用上與過往不同的第二點是，擺脫治者論的色彩，受儒學以外的思想資源之影響。諸如無政府主義、基督教思想，或者日本國學，乃至江戶時代的烏托邦構想等。如德富蘆花等自然主義文學家對托爾斯泰（Leo Tolstoy, 1828-1910）的喜愛、⁶¹江渡狄嶺對安藤昌益（1703-1762）的農業烏托邦之繼承。⁶²

⁵⁹ 有關近代日本普羅文學運動的發展，參照飛鳥井雅道：《日本プロレタリア文学史論》（東京：八木書店，1982年）。

⁶⁰ 岩崎正弥：《農本思想の社会史：生活と国体の交錯》，頁25-38。

⁶¹ 參見柳富子：《トルストイと日本》（東京：早稲田大学出版部，1998年）。

⁶² 參見西村俊一：《日本エコロジズムの系譜——安藤昌益から江渡狄嶺まで》（東京：農山漁村文化協会，1992年）。

不過，需要注意的是，這並不意味著大正至昭和初期的「農本」論中儒家思想的抽離，事實上，也有許多論述是揉合了儒家思想與外來思想而並激發的日本式構想，如權藤成卿（1868-1937）的「社稷」說，就融合了中國的制度學與日本國學。⁶³

就時序而言，「農本」概念自1910年代至1940年代，大約經歷三階段：第一階段是受文明批判（西方沒落說）、人文主義的價值觀，以及文學上的自然主義所啟發的歸農路線；第二階段是受社會主義與無政府主義影響，追求共同農作、實現自治的新式共同體構想；第三階段是被總動員體制論巧妙挪用概念，強調自律與勤勞生產的論述。

一戰期間，面對以貿易立國的英國在大戰時發生的糧食危機，評論家橫田英夫（1889-1926）在《新公論》上撰寫〈新農本主義論〉一文，指出農業相對於工商業的獨特性：

今日所謂「国境なき商工業」が益々發達し、一国の經濟力の主力が之れに傾注され、国家の独立的性質が削弱されて稀薄になり往くのが世界の大勢であるとすれば、独立的性質を帯びている農業を維持することは、一国の独立を確保する上に最も必要になって来る。……国際有事の場合には商工業の一脚は多くは用を為さなくなる。故に国家としては斯かる場合は農業の一脚を以て能く双脚の用を為さしめ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ではない乎。⁶⁴

〔作者自譯〕

今天所謂的「無國界商工業」越來越發展，一國的經濟力量主要集中於此，導致國家的獨立性逐漸削弱和稀薄。如

⁶³ 參見船戶修一：〈農本主義の再検討——權藤成卿の「社稷」〉，《社会思想史学会年報：社会思想史研究》第25号（2001年9月），頁69-72。

⁶⁴ 橫田英夫：〈新農本主義論〉，《新公論》第31卷第1号（1916年1月），頁26。

果這是世界的趨勢，那麼維持具有獨立性的農業，對於確保一國的獨立性就變得極為必要。一旦國際有事（爆發戰爭），商工業之一足多半難以為繼。故就國家而言，於此際難道不應以農業之足，使之發揮雙足之效用嗎？

透過英國糧食危機的例子思考本國產業發展的思路，頗得共鳴。貴族院議員林博太郎（1874-1968）在同年的《農業世界》也發表〈工業本位と農本主義〉一文，指出產業均衡發展的必要。⁶⁵

值得注意的是，大約也是在一戰尾聲，開始出現從重視自我實現的立場主張農本的論述。《中央公論》於1917年7月號企劃「自然生活號」專號。當中，在大正期最早主張「新農本主義」的橫田英夫從個人的生活實踐與自我實現的面向上提倡回歸農業。橫田論道：

人間として最も有意義な生活は、自ら生産者になることである。……農業が趣味に饒である云ふことは、他の何生産業にも比較出来ない特色である。之れは單調な機械的労働でなくて、天地の自然に依って育成する生産物を相手にする故である。故に思へ、一度期に応じて播種すれば、地に落ちて一点粒は靈妙不可思議なる大地の作用と相応じて、根となり芽となり莖となり花となり実となる。……実に一種絶妙なる超科学的、超哲学的、超宗教的な力なることを感ぜずに居られない。⁶⁶

〔作者自譯〕

作為人類，最有意義的生活就是成為一名生產者。……農業蘊含著極其豐富的趣味，此乃其他任何生產活動皆無法

⁶⁵ 林博太郎：〈工業本位と農本主義〉，《農業世界》第11卷第6号（1916年6月），頁1-7。

⁶⁶ 橫田英夫：〈知識階級の帰農を唱道す〉，《中央公論》第32卷第8号（1917年7月），頁110、111。

比擬之特色。蓋因農業並非單調的機械式勞動，其對象乃是依憑天地自然而育成之產物。試思，種子一旦順應時節播下，落入土中後，這微小的一粒種子便會與靈妙不可思議的大地作用相感應，化而為根、為芽、為莖、為花、進而結實。……這確實是一種絕妙的超科學、超哲學和超宗教的力量，讓人無法不感受到它的存在。

將農業勞動賦予哲學與人生意義的作法，帶有對工業社會的反思。抱持相近想法的還有詩人加藤一夫（1887-1951），他是最初引介托爾斯泰思想至日本的翻譯家之一。⁶⁷

橫跨大正與昭和期的農本主義代表人物，亦是五・一五事件關係者的橘孝三郎（1893-1974），他回憶投身農本思想的契機在於，就讀舊制第一高等學校時對托爾斯泰、愛德華・卡本特（Edward Carpenter, 1844-1929）等人回歸自然之論述的嚮往。⁶⁸橘孝三郎於1914年在一高校內雜誌《校友会雜誌》上歌頌生命與大地之偉大：

諸兄よ、之を読んで下さる諸兄よ、私等は共に行きんければならん。共に行きんければならん。そしてそこに私等に恵まれたる生命の偉大なる力がある。私等は何よりも之の生命の力を愛する。私等が之の生命の力に感激して共に与に生き得る時、私等は全く新しき世界を地上に堅固に作り得たのである。私等が生きる所は地上であつたのである。⁶⁹

⁶⁷ 加藤一夫在其著作《土の叫び地の囁き》（1918）中，展現了對田園生活和自然的讚美，至昭和初期，陸續發表了《農本社会哲学》（1933）、《農本主義・理論篇》（1933）等著作。《農本社会哲学》因帶有無政府主義思想，出版不久後便受到禁止販賣的處分。

⁶⁸ 竹內好、橘孝三郎對談：〈ある農本主義者の回想と意見〉，《思想の科学》第18号（1960年6月），頁14-23。

⁶⁹ 橘孝三郎：〈愛と誠〉，《校友会雜誌》第233号（1914年2月），頁53-54。

〔作者自譯〕

各位兄弟，正在讀此文的各位兄弟，我們必須共同前行。必須共同前行。在這裡，我們擁有偉大的生命力量。我們最愛的就是這生命的力量。當我們因為這生命的力量而感動，能夠共同生活的時候，我們就在地上堅固地創造了一個全新的世界。我們所生活的地方就是這片大地。

發表此文不久後，橘孝三郎便選擇從一高輟學，返回家鄉與兄弟、相同理念者創設「兄弟村農場」，並開始著述「農本」相關理論書。橘孝三郎的農本論述認為，農業勞動不同於工業勞動的意義在於，農業勞動者敬畏土地所象徵的大自然之力量，對生產對象（稻米、蔬菜或動物）產生「愛護」之心。⁷⁰「兄弟村農場」在1920年代受到新聞媒體的報導而獲得世人關注，許多心生嚮往者紛紛前往投靠。至昭和農村恐慌發生後，橘孝三郎與海軍的少壯軍人等合流，參與了五·一五事件的策劃。雖然橘孝三郎因此事件一度受到無期徒刑的刑罰，但他於1940年便獲特赦出獄，持續著述不輟，至二戰後始終維持著從「愛護」延伸到「農本」的一貫思想。⁷¹

從橫田英夫與橘孝三郎的「農本」論述來看，大正期「農本」一詞所指稱的語境與明治期的語義發生很大變化。明治期使用「農本」一詞時，論者是以西方近代化為最終目標，將農業作為諸產業之本；大正期使用「農本」時，語境是以農業勞動為人類生命價值之本，期待透過親近自然而獲得解放自我和昇華精神。大正期「農本」的本質，是對歐美與日本的工業化及其帶來的社會問題提出質疑。相較於明治期官僚的國家本位「農本」論，大正期使用

⁷⁰ 橘孝三郎：《農業本質論》（東京：建設社，1932年），頁29-32。

⁷¹ 菅谷務認為，橘孝三郎的農本思想中帶有濃厚的宗教性，橘孝三郎於1930年代發展出的皇道哲學與天皇論更近似一種宗教式的農本思想。參見菅谷務：《橘孝三郎の農本主義と超国家主義：もう一つの近代》（東京：岩田書院，2013年），頁198-214。

「農本」或「歸農」一詞的知識分子，他們的思維模式更多受到無政府主義與社會主義思想的啟發，親近反資本、反西方近代的思想光譜，播下了日後轉向日本主義和國家社會主義的種子。大正期使用「農本」的論者，也重視理念的實踐，「歸農」成為了一種生活方式的選擇。這些知識分子強調人類社會與自然環境有機的和諧關係，抗拒工業社會的機械式運作下原子化的個人。

四、昭和初期「農本」概念的分歧

那麼，何以這樣的「農本」論到了二次大戰期間卻與日本主義、擁護天皇制的皇道論合流，成了推進軍國主義的治者論述呢？針對此問題，岩崎正弥從社會史的角度指出，無論是明治或大正的「農本」論述，都不是將農民生計放在首位，並未對農民貧困的問題提供解決方案。因此，當1930年世界經濟大蕭條波及日本後，農村經濟受到重創，農民的貧困成了深刻的社會問題，脫離農民生活現實的烏托邦難以在現實上有廣泛的實踐，也無法解決廣大貧農的生計困境，這些「農本」論述最終或轉向、或沒落。⁷²

事實上，從概念的內涵與使用群體來看，可發現「農本」概念在1930年代至1940年代初產生巨大變化。就歷史背景而言，昭和農業恐慌發生後，日本政府發起了「農山漁村經濟更生運動」，在全國規模下促進農業、山地和漁村經濟的系統化發展，幫助農民重建

⁷² 關於昭和恐慌後的農本思想，岩崎正弥指出，1932年橘孝三郎、權藤成卿、加藤一夫等人組成的「農本連盟」，確實試圖透過共同勞動、自治運動的模式，打造某種新型共同體的秩序。然而，權藤成卿的「社稷」構想強調民眾通過共同契約、組成擁有共通目的與實踐作為的社會，而非透過自然關係。這種想法最終讓總動員體制的「農國本論」有機可趁。參見岩崎正弥：《農本思想の社会史：生活と国体の交錯》，頁118-120。

經濟。自1932年起，日本政府每年在指定的鄉鎮進行經濟重建，支付補貼，並成立了包括地方有力者在內的經濟重建委員會。該委員會主掌土地的合理分配與利用，控制人力、生產成本與農業產品銷售與物資的分配。「農山漁村經濟更生運動」也對農民進行精神主義的訓練。昭和農業危機對於軍隊的秩序也產生連帶影響。在整個1930年代，日本頻頻發生由少壯軍官和知識分子所組織的，以軍市政變和暗殺為手段的國家改造運動。這些激進運動的參與者，大多同情農村的頹勢，希望發起政變，創造社會改造的契機。⁷³上述無論是政府的「農山漁村經濟更生運動」，或是軍隊與民間的國家改造運動，兩者皆擁有排斥資本主義經濟體制的性質。

在1930年代初期頻繁使用「農本」的論者，是將「農本」放在追求農業勞動獲得自我實現，強調新型自治模式的共同體之脈絡。這方面的代表是橘孝三郎、權藤成卿、加藤一夫、岡本利吉（1885-1963）等人於1932年3月組成的「農本連盟」。該組織發行機關誌《農本社會》，在綱領中宣示：「我等期待根據共同勞動與自治的精神，確立農本社會」，以及「期許達成全人類生活的安定」。⁷⁴然而，有關共同勞動的形式與如何達成自治等方法論，在組織內並不存在一致的見解。因此，在農村貧困最嚴峻的1930年代初期，這些知識分子不曾提出有效救濟農民的方案，「農本」在他們之間自始自終並非一個有共識的概念。這些知識分子也大多不具推行農政改革的政策能力與權力，他們的「農本」論述有很大一部

⁷³ 除了前述的五·一五事件之外，1936年發生的二·二六兵變不僅中斷了日本的政黨政治，事發後的肅軍活動更為支持總動員體制和侵華戰爭的「革新官僚」之掌權，預先鋪平道路。有關1930年代的陸軍與革新官僚，參照黑沢文貴：《大戰間期の日本陸軍》（東京：みすず書房，2000年）。

⁷⁴ 《農本社會》發行不久後即遭到禁止，刊物流傳不廣。本引文的內容，參見田中省吾：〈農村救濟運動の概況〉，《警察研究》第3卷第8号（東京：良書普及會，1932年8月），頁39。

分滲入了對日本性、國粹，乃至皇道的追求，產生了被權力者利用與政治操作的空間。

由於「農本連盟」的國家社會主義化，在當時他們受到來自無政府主義思想陣營的攻擊，⁷⁵社會主義運動家石川三四郎便曾經批判「農本主義」一詞。石川畢業於東京法學院（現中央大學），在學中受洗成為基督教徒。石川於日俄開戰時，與幸德秋水（1871-1911）、堺利彥（1871-1933）等人退出《萬朝報》，在《平民新聞》上發表許多基於基督教社會主義立場的反戰言論，故1910年幸德秋水大逆事件發生後，石川逃亡前往歐洲、非洲。1920年返國後，開始基於自身的「土民生活」思想，發表無政府主義的論考，自1920年代中葉起，成為日本無政府主義運動的核心人物之一。⁷⁶

石川三四郎批評1930年代的「農本」論者，不過是「在有意識或無意識間，從治者、榨取者的角度出發，意圖教化農民」，「這樣的思想並沒有產生站在無產農民的立場來思考之感情」。石川三四郎批判，時人所聲稱的「農本主義」不過是統治者拿來安撫貧農繼續作為糧食提供者和士兵的統治話術，是一種「溫情主義」。⁷⁷

正如石川三四郎所批判的，「農本」詞彙在1930年代後半至1940年代前半，最常被使用的論述脈絡便是總動員體制論。總動員體制的推行者根據總體戰思想，將農民視為人力資源中最重要的一環，並透過戰爭此非常時期的強制性，強勢地推進社會的平準化（Nivellierung）發展。正由於總動員體制論看重資源的合理與有

⁷⁵ 有關無政府主義對農本主義的批判，參見延島英一：《無政府主義と農本主義》（東京：不有社，1932年）。此書亦遭禁止發賣頒布之處分。

⁷⁶ 有關石川三四郎的生涯及思想，參見後藤彰信：《石川三四郎と日本アナキズム》（東京：同成社，2016年）。

⁷⁷ 石川三四郎：〈農本主義と土民思想〉，收於《石川三四郎著作集》第3卷（東京：青土社，1978年），頁96-97。作者按：原文見於《ダイナミック》第4卷第35号（1932年9月），頁149。

效運用，故對廣大的農民提供實質的保護與救濟，許多原本有志於農本自治的農村運動家目睹農村經濟的改善，也自發地跟隨推進侵略戰爭的論述。

1940年農林大臣石黑忠篤（1884-1960）在《農政研究》上的宣言，可作為總動員體制利用「農本」概念進行戰爭動員的恰好例證：

農林方面的事業は本来国家的、公共的であった、利潤の追求を以て進むことは許されず、……今日全産業のプリンシプルは農業主義が商業主義に勝ったといひ得る、今後は自然的に発展して来たものを更に公共、公益優先へ推し進め、他産業を率ひて行くべき時代になったと思ふ、農業報国が出来るか否かは国の礎を築き得るか否かである、⁷⁸

〔作者自譯〕

農林方面的事業本來便是國家的、公共的，不允許以追求利潤為目的。……今天所有產業的原則可以說是農業主義勝過商業主義。我認為，今後は應該進一步推動自然發展的事物以公共和公益為優先並引領其他產業的時代。是否能夠通過農業報國也決定了是否能奠定國家的基礎。

太平洋戰爭晚期的1944年，明治大學教授三神修（1892-1964）也直接主張農本勝於商本：

商本主義的觀念は今日全くこれを拂試すべきである。しかして指導者階層はもちろん、一般国民を挙げて我が肇國以来の最も健全なる農本主義的觀念に徹することが何より必

⁷⁸ 石黑忠篤：〈新体制と農業主義〉，《農政研究》第19卷第8号（1940年8月），頁53-54。

要なことであると思ふ。……農本主義的觀念は大地に立脚し、どこまでも足が地についているのであるから、其の基礎は極めて健全であると言わなければならぬ。⁷⁹

〔作者自譯〕

商本主義的觀念應該被完全拋棄。無論是領導階層還是普通國民，都應該徹底貫徹自我國建國以來最健全的農本主義觀念。……農本主義觀念立足於土地，腳踏實地，因此其基礎穩固至極。

由於中日戰爭陷入長期化，加以日本對美開戰，使得日本必須極度緊縮資源，在各方面進行全盤的勞動力與物資動員。從上述引文可以看出，三神修在戰爭體制下，完全將「農本」與「商本」對立。在總體戰體制下，「農本」再度成為政府鞏固食糧和兵源時所需要的政治話語。此時的「農本」概念，也與計畫經濟、國粹主義、國家社會主義等思想形成政治上的共謀關係。

總結來說，日本「農本」概念自1910年代以來，被帶有不同社會訴求的知識分子所詮釋，呈現複雜的樣貌。第一階段發生在一戰至1920年代末，受到人文主義與社會主義啟發的知識分子，對於明治維新以來宣揚的殖產興業與文明開化口號感到質疑，展開讚揚田園生活、追求農業勞動價值與生命意義的探索。第二階段則是在1929年世界經濟恐慌至1930年代後半葉，目睹日本農村困境的有志之士，試圖透過共同勞動、農村自治，摸索一條不同於西洋近代化的新式共同體之路。第三階段發生在1940年代上半葉，由於日本正持續一場超越國力負荷的戰事，總體戰體制論者將「農本」概念轉化為勤勞生產、自

⁷⁹ 三神修：〈商本より農本へ〉，《実業の日本》第47卷第9号（1944年5月），頁8-9。

律，以及各盡本分的論述，以確保農民們的農業報國與公益優先。透過1930年以來就開始進行的救濟農村與計畫經濟之布局，將廣大農村的勞動力盡收網底，供應戰爭所需的糧食與兵源。

五、結語

本文透過考察近代日本的「農本」概念的變遷及其脈絡，比較知識分子對這項概念的運用差異。針對近代日本「農本」概念發展之特徵，可整理為以下諸點。

明治日本在仿效西方近代化的改革中，將小農的生活與生計置於富國強兵之後。至19世紀末，日本社會在甲午戰爭後，面臨速成地達到「殖產興業」目標後的社會問題，如寄生地主制、勞資爭議、小農生計困頓，以及公害污染等難題，在此時代背景下誕生了呼籲重視農業的呼聲。

19世紀末日本的官僚、政治家使用「農本」一詞時，論者是以西方近代化為最終目標，將農業作為諸產業之本。他們大多抱持農工商業並進的立場，主張穩定的農業可幫助工商業「富國」。明治期的「農本」論者，也試圖將前近代日本型儒教的「仁政」與「通俗道德」概念融合到「強兵」的論述中，試圖從國防著手，鼓吹農民作為兵源的適切性。整體而言，他們的論述立場，更偏重於此時期逐漸掌握政治發言權的寄生地主與企業家之利益。

另一方面，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伴隨資本主義的發展、基督教思想的普及，以及日俄戰爭期反戰議題的發酵，社會主義與無政府主義思想也開始在日本萌芽，並於大正期展現多元的樣貌。

大正期的農本主義者，多為評論家、詩人、社會運動家，他們強調人的自我實現，批判工商業文明的弊端，歌頌田園生活的美

好，追求解放個人於都市生活。這些知識分子著眼於個人對近代化生活的掙脫，他們選擇以農業的傳統價值作為社會之本，也鼓吹個人基於自我意志選擇歸農。「農本」論中的「農」，不僅意味著大地、自然與環境，也意味著「生」的價值。在此脈絡下，大正期的農本主義者藉由詮釋農本概念，發起對明治以降國家官僚主義的深刻反撥，從國家奪回「個人」與「社會」的話語權。

大正期使用「農本」時，其語境是以農業勞動為人類生命價值之本，期待透過親近自然而獲得解放自我和昇華精神。大正期「農本」概念的本質，是對歐美與日本的工業化及其帶來的社會問題提出質疑。相較於明治期官僚們的國家本位與治者本位的「農本」論，大正期使用「農本」或「歸農」一詞的知識分子，他們的思維模式更多受到無政府主義與社會主義思想的啟發，時常與反資本（anti-capitalism）、反西方（anti-Westernism）的思想產生共振，埋下了日後轉向國家社會主義和皇道哲學的伏流。

進入昭和初期，「農本」概念產生巨大變化與分歧。昭和農業危機後的「農山漁村經濟更生運動」，經濟重建委員會介入農民的經濟秩序與精神生活，長期的不景氣也使軍隊與民間誕生了國家改造運動的思潮。在上述背景下，1930年代初期頻繁使用「農本」的論者，是將「農本」放在追求農業勞動獲得自我實現，強調新型自治模式的共同體之脈絡。

然而，昭和初期的「農本」論者之間，並未存在明確的共識與解決方案，也大多不具備政策能力與權力。他們試圖解決的農村經濟問題，最終被總動員體制論奪去話語權。在亞洲太平洋戰爭下，總體戰體制論者將「農本」概念轉化為勤勞生產、自律，以及各盡本分的論述，以確保農民們的農業報國與公益優先。「農本」最終成為政權鞏固食糧和兵源的政治話語，陷入與國家社會主義和皇道哲學的共謀關係。

總結而論，從19世紀後半葉到20世紀前半葉，日本「農本」概念的變化，反映了近代日本對西方近代性與資本主義邏輯的一連串反撥與重構。此概念變遷，不僅涉及產業政策路線的爭論，更牽動了人們對於生產相關的時間觀、產業觀、日常秩序感覺乃至生命主體性的深刻思辨。從明治期捍衛國益的治者論，到大正期追求確立個人的生命實踐，乃至於最後被吸納入總體戰體制的過程，「農本」概念的變遷史，實則交織著個人、社會、國家三者的複雜張力，折射出近代日本尋求主體定位的歷史縮影。

徵引書目

- 布萊恩·蘭德（Brian Lander）著，蔡耀緯譯：《王的莊稼：從農業發展到中國第一個王朝的政治生態學》，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24年。
- 陳威璿：〈太宰春臺《產語》及相關問題再探〉，《臺大文史哲學報》第83期，2015年11月，頁67-108。
- イーストレキ、棚橋一郎共譯：《和訳字彙：ウェブスター氏新刊大辞書》，東京：三省堂，1888年。
- フースチン・ナツタル著，松山察太郎摘訳：《英和对訳普通応用初学字典》，京都：文求書堂，1886年。
- 三神修：〈商本より農本へ〉，《実業の日本》第47巻第9号，1944年5月，頁7-9。
- 丸山真男：《現代政治の思想と行動（増補版）》，東京：未来社，1964年。
- 丸山真男：〈日本ファシズムの思想と運動〉，收於遠山茂樹、服部之總、丸山真男著，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編：《尊攘思想と絶対主義》，東京：白日書院，1948年，頁97-184。
- 大江志乃夫：《徴兵制》，東京：岩波書店，1981年。
- 小川和也：《牧民の思想——江戸の治者意識》，東京：平凡社，2008年。
- 山田斂：《興農管見》，福井，山田斂，1901年。
- 井上哲次郎：〈附録 哲學字彙稿本 Aの部〉，《哲学雑誌》第12巻第119号，1897年1月，頁1-58。
- 太政官：《太政官日誌・明治9年（1-6月）》，京都：村上勘兵衛，1876年。
- 尺振八譯：《明治英和字典》，東京：清水卯三郎，1889年。
- 加田哲二：《日本社会經濟思想史》，東京：慶応通信，1962年。
- 加藤七五郎：〈日本貿易策汎論〉，《日本商業雑誌》第1巻第11号，1891年3月，頁31-46。
- 加藤尚武：《環境倫理学のすすめ》，東京：丸善出版，1991年。
- 加藤陽子：《徴兵制と近代日本》，東京：吉川弘文館，1996年。

- 外務省政務局編：《外事彙報》，東京：外務省政務局，1919年。
- 市川義夫編訳，島田三郎校：《英和和英字彙大全》，横浜：如雲閣，1885年。
- 田中省吾：〈農村救済運動の概況〉，《警察研究》第3巻第8号，東京：良書普及會，1932年，頁37-52。
- 石川三四郎：〈農本主義と土民思想〉，《ダイナミック》第4巻第35号，1932年9月，頁149。後收於石川三四郎：《石川三四郎著作集》第3巻，東京：青土社，1978年。
- 石黒忠篤：〈新体制と農業主義〉，《農政研究》第19巻第8号，1940年8月，頁52-54。
- 安丸良夫：〈近世思想史における道德と政治と經濟——荻生徂徠を中心に〉，《日本史研究》第49号，1960年7月，頁1473-1499。
- 安丸良夫著，島藺進、成田龍一、岩崎稔、若尾政希編：《安丸良夫集1：民衆思想史の立場》，東京：岩波書店，2013年。
- 安達生恒：〈農本主義論の再検討〉，《思想》第423号，1959年9月，頁56-68。
- 竹内好、橘孝三郎對談：〈ある農本主義者の回想と意見〉，《思想の科学》第18号，1960年6月，頁14-23。
- 西村俊一：《日本エコロジズムの系譜——安藤昌益から江渡狄嶺まで》，東京：農山漁村文化協會，1992年。
- 並松信久：〈江戸時代後期の農業思想における自然と生産〉，《農林業問題研究》，第20号第3期，1984年9月，頁124-131。
- 並松信久：〈明治期における津田仙の啓蒙活動：欧米農業の普及とキリスト教の役割〉，《京都産業大学論集・社会科学系列》第30号，2013年3月，頁85-122。
- 坪谷善四郎：《万国歴史全書7仏蘭西史》，東京：博文館，1890年。
- 奈良勝司：〈近世社会の思惟構造と明治維新——研究史の状況と展望によせて〉，《日本思想史学》第50号，2018年9月，頁60-72。
- 岡百世：〈オーギュスト・コント〉，《社會》第1巻第1号，1899年1月，頁44-54。

- 岩崎正弥：《農本思想の社会史：生活と国体の交錯》，京都：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1997年。
- 延島英一：《無政府主義と農本主義》，東京：不有社，1932年。
- 松沢裕作：《自由民権運動——〈デモクラシー〉の夢と挫折》，東京：岩波書店，2016年。
- 林博太郎：〈工業本位と農本主義〉，《農業世界》第11巻第6号，1916年6月，頁1-7。
- 武田共治：《日本農本主義の構造：老農農本主義、官僚農本主義、教学農本主義、社会運動農本主義、アカデミズム農本主義の比較検討を通して》，東京：創風社，1999年。
- 近藤哲生：〈地租改正と寄生地主制〉，《土地制度史学》第3巻第3号，1961年4月，頁16-30。
- 金文吉：《津田仙と朝鮮——朝鮮キリスト教受容と新農業政策》，京都：世界思想社，2003年。
- 後藤彰信：《石川三四郎と日本アナキズム》，東京：同成社，2016年。
- 柳田国男：《農政学（早稲田大学39年度政治経済科第1学年講義録）》，東京：早稲田大学出版部，1906年。
- 柳田国男著，藤井隆至編：《柳田国男農政論集》，東京：法政大学出版局，1975年。
- 柳富子：《トルストイと日本》，東京：早稲田大学出版部，1998年。
- 津田仙：〈農業雑誌編輯大意〉，《農業雑誌》第1号，1876年1月，頁1-3。
- 飛鳥井雅道：《日本プロレタリア文学史論》，東京：八木書店，1982年。
- 原勇六編：《西洋史》第1巻，東京：文学社，1898年。
- 宮地正人：《日露戦後政治史の研究：帝国主義形成期の都市と農村》，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73年。
- 柴田昌吉、子安峻共編：《英和字彙：附音插図》，東京：日就社，1873年。
- 海軍省：《大正三—九年戦役各國海戦關係法令》第23輯，東京：海軍大臣官房，1920年。

- 船戸修一：〈農本主義の再検討——榎藤成卿・加藤完治を中心に〉，《年報社会学論集》第12号，1999年6月，頁119-130。
- 船戸修一：〈農本主義の再検討——榎藤成卿の「社稷」〉，《社会思想史学会年報：社会思想史研究》第25号，2001年9月，頁69-72。
- 荒井郁（之助）編：《英和对訳辞書》，東京：小林新兵衛，1872年。
- 荒木幹雄：〈明治維新の土地変革と地主制形成の研究：丹羽邦男先生の業績とその継承〉，《農業史研究》第27号，1994年12月，頁50-56。
- 酒匂常明：《日清韓実業論》，東京：実業之日本社，1903年。
- 高崎宗司：《津田仙評伝——もう一つの近代化をめざした人》，浦安：草風館，2008年。
- 野本京子：《戦前期ペザンティズムの系譜：農本主義の再検討》，東京：日本経済評論社，1999年。
- 鹿田等編：《広益英倭字典》，金沢：大屋愷哉等，1874年。
- 黒沢文貴：《大戦間期の日本陸軍》，東京：みすず書房，2000年。
- 筑波常治：〈日本農本主義序説〉，《思想の科学》第18号，1960年6月，頁4-12。
- 菅谷務：《橘孝三郎の農本主義と超国家主義：もう一つの近代》，東京：岩田書院，2013年。
- 須田努：〈江戸時代の政治思想・文化の特質——「武威」「仁政」のせめぎ合いと「富国強兵」論〉，收於趙景達編：《儒教的政治思想・文化と東アジアの近代》，東京：有志舎，2018年，頁102-131。
- 飯田武郷：《日本書紀通釈》第2巻，東京：教育出版センター，1981年。
- 嵯峨根不二郎：〈經濟原論〉，《日本商業雑誌》第1巻第10号，1891年3月，頁27-38。
- 新渡戸稻造：《農業本論》，東京：裳華房，1899年。
- 聖徳太子著，聖徳太子奉讃会編：《聖徳太子全集》第3巻，東京：竜吟社，1944年。

- 綱澤満昭：《近代日本の土着思想》，東京：風媒社，1969年。
- 綱澤満昭：《日本の農本主義》，東京：紀伊國屋，1971年。
- 綱澤満昭：《日本の農本主義》（復刻版），東京：紀伊國屋書店，1994年。
- 横井時敬：〈農本主義〉，《実業の日本》第1巻第5号，1897年10月，頁13-17。
- 横井時敬著，大日本農会編：《横井博士全集・農業教育百題》第9巻，東京：横井全集刊行会，1925年。
- 横田英夫：〈新農本主義論〉，《新公論》第31巻第1号，1916年1月，頁20-28。
- 横田英夫：〈知識階級の帰農を唱道す〉，《中央公論》第32巻第8号，1917年7月，頁97-115。
- 橘孝三郎：〈愛と誠〉，《校友会雑誌》第233号，1914年2月，頁41-54。
- 橘孝三郎：《農業本質論》，東京：建設社，1932年。
- 藤井隆至：《〈評伝・日本の経済思想〉柳田国男——『産業組合』と『遠野物語』のあいだ》，東京：日本経済評論社，2008年。
- 櫻井武雄：《日本農本主義》，東京：白揚社，1935年。
- Danbom, David B. "Romantic Agrarianism in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 *Agricultural History* 65, no. 4 (1991): 1-12.
- Dore, Ronald Philip. *Land Reform in Japa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 Freyfogel, Eric T. *The New Agrarianism: Land, Culture, and the Community of Life*. Washington: Island Press, 2001.
- Havens, Thomas R. H. *Farm and Nation in Modern Japan: Agrarian National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4.
- Ligt, Luuk de. *Peasants, Citizens, and Soldiers: Studies in the Demographic History of Roman Ital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